

强势生存

中国原生
文明的核心力量

孙皓晖◎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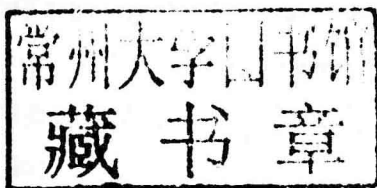


中信出版集团 · CHINA CITIC PRESS

强势生存

中国原生文明的核心力量

孙皓晖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强势生存：中国原生文明的核心力量 / 孙皓晖著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8

ISBN 978-7-5086-5992-3

I. ① 强… II. ① 孙… III. ① 文化史—中国—文集

IV. ① K20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61025 号

强势生存：中国原生文明的核心力量

著 者：孙皓晖

策划推广：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 4 号富盛大厦 2 座 邮编 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承 印 者：北京通州皇家印刷厂

开 本：787mm×1092mm 1/16 印 张：14.25 字 数：186 千字

版 次：2016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201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朝工商广字第 8087 号

书 号：ISBN 978-7-5086-5992-3

定 价：45.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由销售部门负责退换。

服务热线：400-600-8099

投稿邮箱：author@citicpub.com

序 寻求中国文明正源

近年,中国社会已经产生了对中国文明史再认识的新思潮。

这一新思潮,是自发的、缓慢的。但是,它所产生的根基,却具有非常深刻的历史必然性,远比“五四”时期与“文化大革命”时期极端化、简单化、政治化地看待中国历史的“运动”思潮,要深厚得多。

因为,只有在今天,我们才真正摆脱了极端的物质匮乏,走向了深化改革下相对富裕的商品经济生活。我们的国家与民族,初步实现了和平崛起,真正走到了向新的文明形态跨越的历史转折点。这一历史性的转折,决定了一个新的历史命题必然出现在社会意识之中,并且必然引起普遍性的思考。

这个历史命题就是:我们的国家与民族,必须对自己五千年的传统文明作出全面的、深刻的重新解读与重新认识,借以确定我们实现文明跨越的历史根基。这一历史命题第一层面的具体化,是确定:我们的文明历史中究竟哪些是应该继承的良性传统,哪些是应该抛弃的腐朽传统?我们的统一文明根基,究竟应该是曾经的哪个时代?我们的国学,究竟应该是单一的独尊,还是百家争鸣的多元平衡?

如果不能清楚地回答这些问题,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就会始终停留在文明话语权缺失的状态。

我们陷入了奇特的“史障”困境

有一种物理现象叫音障，说的是航空器逼近声速时产生巨大而尖厉的音波震荡障碍。只有突破这一障碍，航空器才能达到超声速飞行。

类似的社会现象，我们可以称之为史障。特定的国家与民族，其社会发展到某种文明突破的临界点时，几乎必然会出现一种对既往历史根基的困惑与迷失，以及由这种困惑与迷失所衍生的社会精神的探索波澜。只有突破这种困惑与迷失，只有推进并深化这种精神探索，才能实现真正的文明跨越。

这种逼近文明突破期而产生的史障，在欧洲中世纪的末期出现过。欧洲人以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的历史形式突破了史障，实现了文明的突破与跨越。在中国，这种逼近文明突破期的史障正在出现，或正在酝酿，但距离突破史障尚远。

中国人的文明史意识，已经沉睡得太久太久了。

就普遍意义而言，在中国人文学界的视野里，只有中国历史，没有中国文明史。换言之，我们的学界只拥有如山如海的历史资料，只拥有对无数历史事件的考据成果，只拥有无数编年纪事的中国通史或者断代史，只拥有无数个专业领域的专门史，只拥有无数个地方区域的地方志整理与地方史记述，等等。从考据意义上说，我们自有纪年的历史起，几乎达到了每一天都有史可考的地步。

但是，我们没有系统整理中国文明发展脚步的历史学成果，甚至在历史研究中渗入文明研究理念，也还很普及，甚或还是凤毛麟角。许多史学著作，虽然冠以“文明”名号，实际上依然是事件整理，或文物遗存考据，或地下发掘考据，远远没有达到文明史研究的水准。也就是说，关于五千年中国文明的特殊历史形态，中国古典文明的基本发展阶段，中国古典文明的特殊历史性质，中国统一文明的正源在哪个时代，其后又经过了什么样的演变阶

段,我们文明史的最基本坐标(最重大事件与最重要人物)等,我们都没有一个接近于社会共识的说法。

正是这种关于文明与文明历史的失语,形成了我们在新的历史转折关口的一种无比奇特的史障。长久的沉吟迷思,既无法对浩如烟海的史料作出基本的文明价值评判,也无法确定未来的突破方向。

突破史障的第一步:确认我们的文明根基

我们的文明历史有5 000余年。我们的发展道路是极其特殊的。

说极其特殊,因为我们的古典文明形态,在全世界是独一无二的大文明系统。无论相比于欧洲,还是相比于美洲、非洲,抑或是相比于亚洲其他国家,中国文明都是一个由庞大系统构成的独一无二的文明体系。对如此一个拥有漫长历史而又在自己的土地上绵延相续至今且庞大无比的文明系统,世界说不清其中诸多的要害问题,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中国人同样说不清其中最基本的若干问题,就是非常奇怪的了。

我们拥有最庞大的文明体系。

我们却没有与之相匹配的中国文明史研究体系。

这就是我们文明话语权的困境,就是我们的史障。

突破这一困境,突破这一史障,首先的一步,是要说清我们的文明根基。

我们的文明,从神话时代就已经开始了。虽然,鉴于缺乏文字记载的可靠性,我们可以将神话时代大体先搁置一旁,而只在思维方式的意义上研究中国神话的特殊文明价值。但是,从黄帝时代开始,我们的文明脚步已经是清楚的,是越来越清楚的。之后,我们历经了近千年族群大联盟文明的发展,在大禹治水的后期,我们进入了国家时代。

此后,历经夏(早期邦联制国家)、商(成熟邦联制国家)、西周(经典联邦制国家)、春秋(突破联邦制时代)、战国(大分治时代)、秦帝国(大统一时

代) 六个时代。

从文明史意义上说,这六大时代,分作三大历史阶段:第一阶段,夏、商、西周,是我们的国家文明由邦联制向联邦制不断跨越的历史阶段;第二阶段,春秋、战国,是我们的文明以不断走向分治的历史形式,酝酿新的文明突破的历史阶段;第三阶段是秦帝国统一中国,进而统一中国文明的历史阶段。

自秦帝国创建中国统一文明开始,我们的文明形态在此后两千余年没有变化。

这就是说,历经近两千年的六次历史大锤炼,我们终于实现了文明大爆发与文明大飞跃,形成了全人类古典社会最为发达、最为成熟、最为稳定的统一文明。在全人类的历史上,历经六次大翻新、大锤炼、大创造而最终成型的稳定文明,只有我们。

我们的文明体系总根基,是六大时代。我们的统一文明根基,是秦帝国时代。

我们的统一文明在流变中趋于僵化腐朽

自西汉汉武帝时期起,我们的统一文明开始了变形。

基于政治上的逆反心理,基于偏狭的“安定”意识,汉武帝时期的国家政权,自觉地尊奉一种保守主义的学说体系作为整个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利于对社会灌输服从意识。这就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明大转折。这一转折的文明史意义,是第二代中国统一政权背弃了中国文明的多元化传统,仅仅将诸子百家中的一个学派,抬上了国家意识形态的宝座,而对无比丰厚的中国原生文明思想价值大体系,采取了自觉遏制的政策。

自此,儒家学说变成了国家的教化工具。

中国原生文明的多元思想价值体系,开始了国家遏制之下的萎缩过程。

由此,我们文明的创造精神渐渐趋于凝滞。其最大的危害,是中国的修

史权力,以及国家对社会文化、教育、思想的发展方向的主导权力,从此交到了一个具有严重意识形态偏见的学派手里,别种理念不能染指。

中国文明史的萎缩趋势,由此开始,弥漫后世,未尝稍减。

自公元10世纪后期的宋代开始,中国文明严重下滑,进入了整个社会精神严重僵化的时期。宋、元、明、清四个时期,历时近千年,中国社会出现了以“存天理,灭人欲”为基本诉求的理学体系,将原本已经是保守主义的儒家思想体系“提纯”到了极端僵化的非人类精神的“绝学”境地。由此,出现了扼杀思想活力、扼杀自由创作的文字狱;强化了迫使社会知识阶层皈依意识形态教条的科举制。这一时期,中国民族的思想文化,已经发展为严密的绝对教条体系,进而衍生出弥漫整个社会的教徒式治学风习。

中国社会的理性精神、探索精神、正义精神、百家争鸣精神、原典创造精神等,基本上被窒息,基本上被扑灭。知识分子只能以钻研经书、考据注释、官方修史、整理笔记、撰写游记等方式,作为治学正统途径。整个社会人文领域,堕落为一种“只能解释,不能创造”的庞大的神学院体系。秉持思想创造精神的个别学者,被整个社会与官方视作大逆不道。社会实用技术的研究,则被冠以“奇技淫巧”的恶名,受到正统意识形态的极大轻蔑。

在如此僵化的社会状况之下,宋代以后的中国社会,民族进取精神日渐委顿,国家竞争意识几乎泯灭,绥靖主义思潮大肆泛滥。另有外部入侵,大规模的汉奸政府、汉奸军队、卖国条约、割地求和、镇压抵抗力量等种种恶行,孽生于中国大地,成为整个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的丑陋奇观。

这,就是今天我们脚下的社会历史土壤。

这样的社会历史土壤,能作为我们实现文明跨越的历史根基吗?

在文明继承的意义上,我们必须具有一种立足于整体中国文明史的大器局、大气魄。我们的文明视野,必须高高越过两千余年的文明停滞期,直接与我们的原生文明时代实现精神对接,直接与我们的文明正源实现精神对接。

那里有我们的光荣，那里有我们的梦想，那里有我们的大阳精神，那里有我们的凛凛风骨，那里有我们如山岳如大海的原典世界，那里有我们的国家竞争精神，那里有我们的民族血气与大争之心，那里有我们实现凤凰涅槃的文明圣地……归根结底，那里是可供我们坚实矗立的历史土壤，那里是我们实现历史飞跃的无比广阔、无比丰厚的文明资源宝库。

序 寻求中国文明正源 1

我们的整体困境：世界文明的沼泽期 1

走出中国历史意识的沼泽地 15

永续不朽的历史奥秘：中国文明的三大历史特质 25

中国原生文明与古希腊文明的比较 45

中国原生文明与古罗马文明的比较 63

确立中国文明的继承原则 77

历史主义是理清中国文明史的根基 85

文化霸权与文明衰落：儒家独尊的历史解析 10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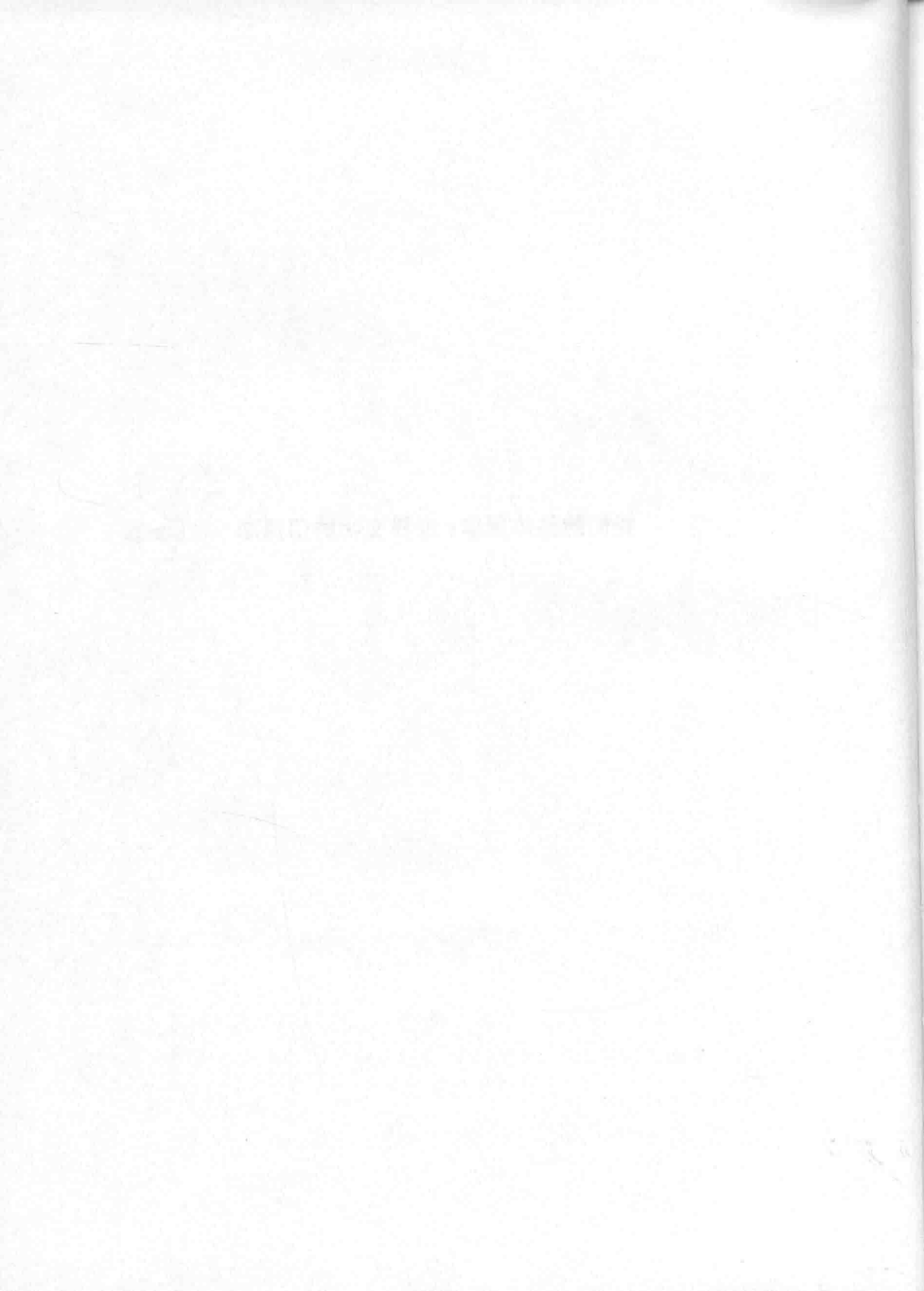
祭秦论：中国原生文明的永恒光焰 133

后记 积微深掘 理我文明 211



我们的整体困境：世界文明的沼泽期





人类文明的发展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整体困境

从公元前3000余年的古巴比伦王国开始，人类各民族相继进入了国家时代。

以国家为单元的人类文明的竞争演进，迄今已经有五千余年的历史。

漫漫岁月，沧桑变幻。人类文明在灾难与收获的交互激荡中拓展伸延，已经由缓慢发展的古典文明社会，进境为发展速度骤然提升的工业文明时代了。但是，文明的进境与发展速度，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人性，也没有改变人性的基本需求，更没有改变人类面对的种种基本难题。贫困与饥饿依然随处可见，战争与冲突依然不断重演。古典社会曾经反复论争的种种基本问题，并没有因为工业与科学的创新而消弭。甚或相反，科学的发展，交通的开拓，信息的密集，使人类的生存空间更加狭小，生存资源更显贫乏，各种冲突更为剧烈、更为残酷、更为全面。

我们蓦然发现，当下的人类世界，面临着一个整体性的困境。

这个整体困境就是，人类技术手段的飞速发展与人类文明停滞不前的巨大矛盾。

一方面，我们的生产能力，我们的科学发现，都在日新月异地发展；我们对宇宙空间的普遍探索，已经拉开了绚烂的序幕；我们对人类生命的微观

认识，已经达到了相当的高度，也许不久的将来，我们对复制生命的探索就会成为现实；我们的物质生活水平，获得了较为普遍的空前改善，世界一部分人的生活水准与享受方式，已经进展到令任何古典贵族都瞠目结舌的地步；在人类社会的整体结构方面，我们已经拥有了解决人类共同问题的跨越国家政权的世界组织——联合国，我们几乎已经迈入了建立世界性文明秩序的门槛。这一切，似乎都很美好。

可另一方面，我们的文明发展却停滞不前，我们的道德水准正在急剧下滑。

腐败与堕落的生活方式，充斥着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的另一极；巨大的浪费与极度的匮乏并存，形成了令人触目惊心的两极差别；对遍布世界的贫困、饥饿与天灾人祸，发达国家有着普遍性的淡漠，共同救援组织的所谓作为，始终停留在杯水车薪与虚应故事的层面上；人类的文明教育，对欠发达地区普遍存在的文化缺失现象无能为力，致使主要以这些地区为社会土壤所滋生的邪教组织以及恐怖主义势力不断蔓延，并与各个国家的分裂势力相融合，掀起了前所未有的人类文明的沙尘暴；作为世界组织的联合国，则日益沦为少数强势国家操纵下的某种机器，其主持正义与伸张公理的能力已经微乎其微；掌握最先进战争手段的强国，依然醉心于价值观的输出，醉心于意识形态的对峙，忙碌于对世界资源的巧取豪夺，忙碌于富裕集团对全球利益无休止的分割；结构与目的同样混乱的各种军事同盟，不断在世界范围内出现，都在像堂吉珂德一样地盲目寻求与风车作战；曾经百余年领先世界，并曾以炮舰强权主导世界文明进程的资本主义国家集团，已经在一场首先爆发于其心脏地带的经济大危机中，褪尽了“活力无限”的光环，显示出空前的国家疲惫与制度弊端；对“世界警察”的普遍不满正在不断地弥漫增长，在某些地区已经淤积为深刻的仇恨，并且以丧失理性的恐怖主义方式不断爆发出来。

面对种种灾难与整体性困境，我们的世界陷入了一种万事无解的尴尬

局面。

从总体上说，我们这个时代，解决普遍问题的能力正在急剧衰减。极端化的例子有两个：一个是实际争端无法解决，即对很小面积且有争议的领土与海域资源，大多数相关国家宁可兵戎相见，也不愿意接受“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开阔思路；另一个是文化争端，强权国家在炮舰时代通过侵略战争方式抢劫了大量世界级文物，无论被抢劫国家如何呼吁，强权者都只是颇有“绅士风度”地耸耸肩了事。

更重要的是，我们当下的时代，已经丧失了文明发展的主题与方向，丧失了一个时代应该具有的主流精神。曾经主导世界文明秩序的列强力量，已经无法创造出新的人类精神，更无法以高远的视野、开阔的胸襟，平衡人类的利益冲突与价值冲突。这种曾经的主导力量，正在各种实际细节争夺与意识形态对峙中持续地沉沦下去。世界秩序失去了曾经的主导精神。人类的基本价值理念，正在迅速地模糊化、逆反化。

真正值得忧虑的是，面对如此巨大的整体性困境，面对如此重大的人类文明危机，世界政治家阶层却是空前麻木，既没有自觉感知的理性揭示，也没有奔走呼吁的世界精神与天下意识，更没有高瞻远瞩、联手协力的主动磋商应对战略。频频举行的形形色色的高峰会议、强国集团峰会，除了发明出种种时尚而庸俗的外交秀，在圆桌会议上争吵议论的，几乎都是中世纪地主一样的利益纠葛。整个人类所期待的着眼于解决基本问题的诉求，在我们这个时代的政治家视野里，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

这个巨大的整体性困境，使世界文明的发展陷入了极其罕见的沼泽期——

无论是前进或是后退，如果我们盲目作出反应，我们就有可能全面沉陷下去。

结束困境的途径只有一个，要从对人类文明发展史的审视中，寻求我们的思维突破。

人类文明如何走出第一次沼泽期

在世界文明发展史上，一个时期的突破经验，给我们提供了讨论路径。

这个突破时期，就是人类结束第一次文明沼泽期——中古社会的历程。

中古文明沼泽期，在西方，是指罗马帝国后期及罗马帝国灭亡后一千余年的文明停滞期。在东方的中国，这个时期开始得要更早一些，是指秦始皇创建的中国统一政权灭亡后两千余年的文明停滞期。在这样的文明停滞期，人类在技术层面上都获得了某种程度的发展，尽管速度很缓慢；但在文明形态的发展上，却始终是徘徊不前的。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文明沼泽期，亦即文明史的停滞期。

这里，一个逻辑的环节必须清楚：什么是文明意义上的发展？

文明，是人类在“自觉的精神，自觉的秩序”意义上的整体生存形态。文明意义上的发展，最重要的基本点，在于社会制度的创新，在于社会生活方式的普遍提高，在于社会生产方式的普遍改变，在于社会价值观念与社会主流精神的历史性跃升。在人类社会的整体发展中，生产手段（技术）的局部更新，并不必然与文明发展相联系，更不必然等同于文明发展。古典社会在某个领域的技术手段，完全可以达到当代技术无法复制的地步。但是，仍然不能由此而说，古典时期的文明发展程度比当代要高。因为，技术手段如果不能发生普遍性变革，从而达到激发整个社会文明发生普遍变革的程度，技术就永远是局部的生产手段，而不是文明的历史坐标。

中国在隋唐之后的历史现象，很能说明技术发展不能等同于文明发展的道理。

东方中国的四大发明，其中的两大发明——火药与印刷术，在公元10世纪前后的宋代获得了极大发展；中国的古典数学，在元代出现了新突破；中国的古典筑城技术，在明代达到了最高峰；中国的古典园林技术，在清代

达到了最高峰。这些，都是古典科学技术的很大发展。但是，中国的宋、元、明、清四代，恰恰是中国文明严重下滑、社会严重僵化的时期。这四个时期，历时千余年，中国出现了以“存天理，灭人欲”为基本诉求的理学体系，出现了以扼杀思想活力与自由创造为基本诉求的文字狱，强化了以迫使社会知识阶层皈依意识形态教条为基本诉求的科举制，又衍生出弥漫社会的考据学风。由此，中国社会的理性精神、探索精神、创造精神，基本上被窒息，基本上被扑灭；知识分子只能以钻研书缝、考据细节为治学之正统途径；秉持思想创造精神的个别学者，被整个社会与官方视作大逆不道；社会实用技术的研究，在这一时期被冠以“奇技淫巧”的恶名，受到正统意识形态的极大轻蔑。甚或，宋明时期还对中国文明的历史遗产进行了全面清扫，连荀子这样具有客观立场的战国大师，也被请出了孔庙，并有了极其荒唐的“灭荀运动”。至此，中国的修史权力与对社会文化思想的主导权力，彻底全面地落入了具有严重意识形态偏见的唯一一个学派集团手里。思想领域的客观公正精神，社会学派的多元发展，从此消失殆尽。如此“教化”之下，宋代以后的中国社会，民族精神日渐委顿，另有外部入侵，大规模的汉奸政府、汉奸军队便孽生于中国大地，成为整个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的丑陋奇观……

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说，中古社会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沼泽期。

同是人类文明的第一次停滞期，西方社会的文明突破，取得了历史性成功。东方社会的中国，却陷在了文明沼泽期，长期不能自拔。无论这种差别的背后隐藏了多少历史的奥秘，我们都暂且搁置在一边。这里最重要的问题是，西方的欧洲如何突破了中古社会的文明沼泽期，它给当代世界提供了什么样的历史启示？

欧洲的文明突破，经历了两个历史阶段，历时四百年左右。

第一个历史阶段是发端于14世纪而弥漫于16世纪的文艺复兴。最简单地讲，就是欧洲的艺术家的最先深感中古社会的僵化窒息，开始怀念并召唤古希腊与古罗马时代的鲜活艺术精神，并实践于当时的宗教艺术创作。